

「當前大陸青年問題」座談會紀要

本中心中國大陸組

會議名稱：第八十二次學術座談會

討論主題：當前大陸青年的心態與動向

主辦單位：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中國大陸組

時間：民國七十五年三月二十六日下午二時至四時三十分

地點：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二樓會議室

主席：邵玉銘

一、主席致辭：

各位貴賓、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今天我們中心第八十二次學術座談會，討論的主題是「當前大陸青年的心態與動向」。大家知道去年十二月九日，是「二·九運動」五十週年紀念日。我想知道份子尤其是青年學生，在中國現代史所扮演的角色，實在極為重要。這當然跟中國文化傳統有關，我們所謂的「士農工商」，「士」曾是四民之首。知識份子照范仲淹的講法，是「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我們對自己的期許，乃是在「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種抱負實在非常之大，氣魄也非常壯偉。從孫中山先生進行國民革命開始，歷經北伐、抗戰迄今，青年是非常重要的革命與改革的力量。個人認為，我們在大陸的失敗，先是在思想戰場上失敗，然後才是軍事與政治的失敗。思想戰場的失敗，始自青年心態與思想之轉變。譬如在一九三〇年代，曾發生和與戰的問題，高級知識份子如胡適之、蔣廷黻等主張「和」並支持先安內再攘外的政策，可是絕大多數青年學生却主張「戰」。先總統主張的安內攘外的政策堅持了六年之久，也無法抵擋主戰的時代潮流。我常在想一個問題，即如果先安內再攘外的政策能再延續兩年，而不在一九三七年發生抗日戰爭的話，也就是假如西安事變晚發生一年，中共可能被消滅了，那中國現代史就要改寫。但為什麼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發生西安事變呢？部份原因是洶湧學潮對張學良的部隊、對整個華北局勢的重大影響所致。一九三五年「一二·九事件」顯示的意義是，青年學生對整個國家基本的國策與方向的想法有問題。如果

那時沒有青年學生給政府的壓力，及西安事變晚發生一年，則剿匪戰爭不無可能成功。也就是說，在和與戰上，在安內攘外上，再堅持一至二年，那麼整個現代史就得重新改寫。另外，在一九四六到一九四九年發生的學潮，也是由高級的知識份子帶頭，如羅隆基、章伯鈞、錢瑞升、張奚若、吳晗等，再加上西南聯大為主及其他上海、南京與北平的青年學生，以所謂反內戰、反飢餓、反迫害掀起學潮，使我們的民心士氣受到嚴重的打擊。我們的民心士氣與其他國家不大一樣，它主要受到知識份子與學生的影響。士為四民之首，知識份子將自己的主張帶到街頭巷尾，影響工商界人士，甚至軍政人員。所以，假如在一九四六至一九四九年沒有學潮的話，大陸不可能在短短四年的時間全部淪陷。對中共而言，這却是「一二·九」運動以來的學運餘波。從黃花崗、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大陸淪陷，一直到鳴放運動，文化大革命等一連串的革命運動中，我們可以發現，任何一次革命運動的高潮，都有青年學生參與。假如歷史的經驗有任何指引意義的話，那麼今後中共政權的變動，也必然由青年學生身上開始，故去年下半年發生的大陸學生運動，實值得我們深入探討。中國大陸組此次以中共學生運動為主題，深入探討，相當有價值。而且，我深信假如中國大陸將來有什麼重大的變化，必然是先由大陸青年發生鉅變開始。怎樣能將中國青年運動這股高潮，由過去針對國民政府，轉而導引到摧毀中共政權，這是除了學術研究之外，也是政府工作的目標。謝謝！

二、引言報告之一：汪學文先生報告「大陸青年的思想與言行」

(一)

八十年代的大陸青年，乃是一代不平凡的青年。他們是吃共產黨奶水長大的，但是卻「生在困難時期、長在動亂時期、學在調整時期」，換句話說：他們「生下不久就挨餓、上學不久就停課、剛剛畢業就插隊、回隊幾年待分配、結婚沒有窩、生活最窘迫」。而「文革」結束，「四人幫」整肅以後，中共推展「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之時，他們隨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萌發了新的覺醒，開始了新的追求。

一九八五年，聯合國確定該年為「國際青年年」，中共乃成立「國際青年年中國組織委員會」，並於五月下旬在北平舉行國際集會，討論的主題是「青年在和平與發展中的作用」。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大陸青年曾參加左翼的「世界青年保衛和平運動」，但那是以蘇聯及東歐陣營為主，不是世界性的。如今，大陸青年參加聯合國的「國際青年年」活動則是全球性的。在意識形態上有了相當的影響。

有一名大陸青年根據自己的觀察和瞭解，曾對當代大陸青年的心理作如下的刻畫：

「當代大陸青年最關心改革成功，四化實現」；

「最怕失望的疊加」；

「最苦惱的是隨意被社會指責」；

——「最厭惡的是虛偽」；

——「最痛恨的是社會弊病」。

顯然，當代大陸青年，已逐漸從迷惘中覺醒，呈現出新的思潮，不過，由於大陸青年仍處於錯綜複雜的社會局勢中，其思想或左或右，言行有高有低，目前尚未趨於完全一致的觀念與態度。

(二)

當前大陸青年的思想，概括地說，約有積極的「四爭思想」和消極的「三失思想」。所謂「四爭思想」，就是大陸青年於「文革」後不斷地表現出「爭自由、爭民主、爭法制、爭人權」的思想，他們並且對於「中國往何處去」的問題也提出答案和方向。所謂「三失思想」，就是失學、失業、失望。當前大陸青年有很多處於失學和失業的態度，他們不僅悲觀失望，而且日趨墮落，犯罪率逐漸上升，致使犯罪問題日趨複雜，大陸社會更為混亂。

中共不僅對於「三失思想」相當困惑，而且對於「四爭思想」非常憂慮。因此，一九八一年八月上旬，中共「教育部」曾召開「全國學校思想政治教育會議」，集中討論如何加強和改善學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一九八四年十月中旬，中共「中央宣傳部」和「教育部」曾聯合頒發「關於加強和改進高等院校馬列主義理論教育的若干規定」，要求所有的大學生都必須認真學好這門課程。其實，所謂思想政治教育，當前仍無效果，例如：

在初中語文課本第二冊第三課中，提到所謂「憶苦思甜」。據說有個教師教完課文，以「幸福的童年」，要求「長在紅旗下」的青年學生也「憶苦思甜」一番。結果，有個學生在作文中寫道：「在我記憶的童年，爸爸被隔離審查，媽媽下放五七幹校，三年抄了兩次家，我的童年，充滿著憂愁和眼淚，沒有幸福。」其實，這僅僅是類此「政治掛帥」之反效果的一例而已。

而大學生對於思想政治教育也普遍地不滿，紛紛反對。據說，有些大學生公開指出：「黨史的講假話、教哲學的講空話、教政治經濟學的講大話、教科學社會主義的講廢話」。這不僅是對教師的諷刺，而且更是對中共整個宣傳教育的控訴。

近年來，大陸青年除「三失思想」和「四爭思想」外，還流行「實惠主義」和「逆反心理」。

所謂「實惠主義」，就是「看透的思想」，認為講「革命思想」是空的，沒有用，還是講點個人的「實惠」比較好。這些青年對於四個現代化漠不關心，却熱衷於個人的「小四化」（服裝時髦化、行動自由化、生活高級化、家具現代化）。

所謂「逆反心理」，在心理學上就是指「你要我這樣，我偏要那樣」的情緒，其表現，多半是懷疑、抵觸和不滿。

據說，中共幹部和教師，對於青年學生的「實惠主義」和「逆反心理」，苦口婆心的諄諄教誨，都不起作用。顯然，當前大陸青年的各種思想，中共縱然使用一貫對待知識份子的「思想改造」的政策和方法，也難以控制和轉移。

當前大陸青年的言行，除掀起學潮、進行示威、推展抗議以外，大都普遍地反對「四項基本原則」：

第一；反對「社會主義道路」——近來大陸報刊出現某些文章，宣揚「社會主義存在異化」和抽象的「人性」、「人道主義」，對青年頗有影響，因此，中共承認：「有些青年自然會有那麼一個印象，反正你這個社會主義不如資本主義」。

第二、反對「無產階級專政」——有的青年指出：「文革」時的「封建法西斯政治」就是專政，如今仍然存在，並未改變；有的青年更坦白地說：「獨裁專政的領導者，對權力言是暫時的上帝，對人民言是永久的公敵，對歷史言是千古罪人。獨裁專政是完全不可取的，大陸新的畫卷必將展開，光明就在面前」。（《五四論壇》第十期專文）顯然，大陸青年因「獨裁專政」而紛紛產生「變天思想」。

第三、反對「共產黨的領導」——其主要對策就是不入黨。一九八二年的統計，大陸普通高等學校在校學生中，黨員僅佔學生總數的一·九%，有相當一部份低年級班沒有黨員，高年級班建立不起黨小組。一九八四年的統計，全大陸大學本科黨員數量不到學生總數的一%，是一九五六年以來最低的一年。有的中共幹部子弟却指出：「入黨頂不了吃，頂不了穿，黨員還不如我呢！」本人記得，在抗戰勝利後，中共一方面高叫：「國民黨應該退出大學」，一方面則把「職業學生」陸續派進大學；如今在大陸，共產黨却有自然地退出大學的趨勢。

第四、反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一九八一年三月，北大和清華的學生在「學生會」的就選中，有的公開以「我不是共產黨員」、「本人不信仰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等言詞，來爭取選票，而在別的大學，有的學生說：「我是學理工的，不是搞政治的，馬克思主義對我沒有什麼用處」；有的學生甚至說：「馬克思主義也是一種宗教信仰，我不信宗教，所以也不信仰馬克思主義」。當前大陸青年學生不僅普遍地反對馬克思主義，而且紛紛去找別的主義，據說：「從孟德斯鳩、盧梭到孫中山都找，甚至找到卡特那兒去。」

大陸青年在反對「四項基本原則」之餘，有的青年還公開責問中共：「鬭爭了三十年，建設了三十年，却比人家落後了三十年，革命給我們的是什麼呢？」（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七日《人民日報》）使得中共難以回答這個問題。

（四）

就大陸青年的心態而言，當前正逐漸形成三大新思潮：

第一、厭惡共產主義——大陸青年對於共產黨與共產主義，早在「文革」前就有矛盾和厭惡，如今則變本加厲。例如在「北京四一中學」裏，有一名共青團團員，在一次政治考試中放棄答卷，原因是「共產主義渺茫」。此外，還有人提出：「共產主義幻想論」。

第二、羨慕資本主義——有些大陸青年曾坦白表示：「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生活那麼好，我寧願過那種受剝削的生活」。

第三、嚮往三民主義——早在一九七九年五月，大陸地下刊物——《求是》就發表題為《已到十字路口》的文章，指出向前走的三條路：第一條是修正主義道路，第二條是資本主義道路，這兩條路都不能走，第三條路是回到老中國，實行臺灣式的三民主義；這條是好路，應該派人去探路，以便朝好目標前進。

(五)

就大陸青年的動向而言，當前正逐漸形成三大新目標：

第一、嚮往自由民主——有些大陸青年認為拉幫結派、壓制民主、損害人民的狀況不能再繼續下去，要建設的是高度民主、高度自由，以符合大多數人的心願。

第二、滋長個人主義——據說當前大陸大學生，個人主義相當普遍而且逐漸系統化和理想化。

第三、爭取理想前途——當前大陸青年學生，大都逐漸見多識廣，新思潮突出，紛紛爭取理想前途，其實例大約如下：

1. 有的大學生抱著「將來圖個好名聲，找個好工作，分配個好地方，建立個好家庭」的理想前途。

2. 大陸青年學生，在「文革」前曾強調：「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如今又冒出一種類似傾向：「愛好ABC D，馳騁世界各地。」據說上海復旦大學世界經濟系的學生就熱衷於學習外語，三分之一的學生不肯選修其他課程，有的連一些必修課也丟了。

3. 有些大學生中，「洋風」、「港風」、和「臺風」頗盛，紛紛學習洋文、結交洋人，甚至結交異性洋人為脫離大陸的手段。據說大陸上還流行一首模仿毛澤東的「清平調」云：「天高雲淡，望斷南飛雁，不到臺灣非好漢，屈指行程二萬。梧桐山上高峰，壯志漫捲西風，今日地圖在手，何時到達九龍？」顯然，這些都是希望投資自由的思潮。

總而言之，當八十年代之初，中共對世界緊閉的竹幕半開後，大陸青年看到了發達國家的「大千世界」，看到了大陸的落後差距，於是普遍地產生了新觀念和新動向，對社會主義制度深感懷疑和不满，而對臺灣，以及自由國家的繁榮現象頗為嚮往，甚至紛紛下定決心：「從我做起，從現在做起」，以爭取理想前途。

(六)

當前全世界正注視著中國大陸的三大問題：1. 中共能否在本世紀末實現四個現代化？2. 共產主義是一個可以實現的理想、還是一場導致窮困的幻想？3. 中國大陸往何處去？對於這三大問題，大陸青年似已明確地提出答案：前兩題是否定性的，後一題則有正確的方向和發展。

基於此，本中心這次座談會，特別選擇「當前大陸青年的心態與動向」作為主題，共同研討。

三、引言報告之二：陳力生先生報告「大陸青年的求學與就業」

最近幾年，大陸高等院校校示威抗議事件時有所聞，青年學生思想動盪不安，值得重視。由於青年階段，大抵在求學與就業過程中度過，因此，從了解大陸青年求學與就業狀況入手，或可對當前大陸青年的心態與動向，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求學的環境

當前大陸青年的求學環境，一般而言，比起「文革」時期改善許多：

1. 一九七七年五月二十四日，鄧小平表示：「我們要實現現代化，關鍵是科學技術要能上去，發展科學技術，不抓教育不行」。八月八日，在「科教工作座談會」上說：「科研工作、教育工作是腦力勞動、腦力勞動也是勞動嘛」。次年四月，在「教育工作會議」上又說：「我們要在科學技術上趕超世界先進水平，不但要提高高等教育的質量，而且首先要提高中小學教育的質量」。

在此一政策指導之下，中共逐步改變「文革」時期輕忽教育的惡習。

2. 根據「國家統計局」關於一九八五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透視，去年大陸教育部門的情況約為：

初等教育：全大陸小學在校生一億三千三百七十萬人，學齡兒童入學率百分之九五·九。

中等教育：中等學校在校生共五千一百六十八萬人，其中高中階段的職業技術教育在校學生共四百一十六萬人。

高等教育：普通高校招收本專科學生六十一萬多人，在校生共一百七十餘萬人。畢業生三十一萬人。研究所在學研究生八萬七千人，畢業生一萬七千人。

與一九七六年比較，小學在校生減少一百三十餘萬人，中等學校在校生減少約七百三十七萬人，高等學校在校生則增加約一百一十四萬人。

再以一九八三年為準，大陸各級學校所數為：小學八十六萬多所，普通中學九萬六千餘所，中專三千九十所，高校八百零五所。與一九七六年相比，小學減少約十八萬所，普通中學減少九萬六千多所，中專則增加六百四十七所，高校增加四百一十三所。

3. 一九七八年起，恢復研究生招考制度。一九八〇年二月，五屆「人大」常委會第十三次會議又通過「學位條例」，自翌年元月一日開始實行學士、碩士、博士三級學位制。一九八二年，八千五百六十二名研究生獲得碩士學位，次年，十八名研究生獲得博士學位。使得有志深造的青年，得以繼續進修。

4. 一九七八年，中共恢復派遣留學生制度。留學生員筭深造的國度以美國、日本、西歐等先進國家為主。學習科別則以自然學科為主，社會學科為輔。雖然近年來中共留學政策時鬆時緊，但是這也給青年求學提供了一條途徑。

5. 除了正規學校教育之外，還有其他各種方式的教育。一九八三年，趙守一在答《中國青年》雜誌記者問的時候指出，當前

中共從制度上，建立五個系列的教育，即普通教育、職業教育、業餘教育（包括業餘大學、電視大學、函授學校、各種講座等）、在職教育（包括各種黨校、幹部、科技人員等的繼續教育）、自學。後三者提供考試、考核的條件，合格者可獲文憑，在錄用、招聘、提拔、評定職稱和工資福利等方面一樣看待。這種方式，使得大陸青年，在離開學校之後，還有機會繼續進修。

就業的狀況

大陸青年的就業，隨著經濟體制的改革，也有與以往不同的情況：

1. 在經濟體制未行改革之前，初、高中畢業學生，未繼續升學者，在農村的入生產隊，在城市的可進入全民所有制或集體所有制的企事業單位。由於僧多粥少，未包分配，沒有關係者只好在家待業，形成龐大的待業青年隊伍。而在經濟體制改革之後，容許個體經濟存在，待業青年因此可以自謀生路，就業壓力多少得以舒緩。（按：所謂待業就是失業）

2. 在高等學校方面，高校畢業生謀職以往悉依分配，造成入學後職業便有保障，易於滋生「吃大鍋飯」的態度，影響教育品質，因此，近年來中共擬議改革高校畢業生分配制度。

去年五月中共中央公佈的「關於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中，曾規定高校招生計劃制度和畢業分配制度實行三種方式的改變。一是「國家計劃招生」，這部分學生的畢業分配，「實行在國家計劃指導下，由本人選報志願、學校推薦、用人單位擇優錄用的制度」。偏遠地區，實行定向招生，待遇從優。二是「用人單位委託招生」。「委託單位要按議定的合同向學校繳納一定數量的培養費，畢業生應按合同規定到委託單位工作」。三是「在國家計劃外招收少數自費生」。要交培養費，畢業後可以由學校推薦就業，也可以自謀職業。

「決定」制定後，去年高校畢業生的分配，就已有變革。「由國家下達計劃直接分配的部分有些減少，教育部所屬院校畢業生的分配普遍採取供需見面的辦法，地方院校的畢業生全部由各地根據國家規定的原則自行分配」。這些改革，基本上仍未脫計劃分配方式。

3. 今年元月，「國家教育委員會」發出「普通高校接受委託培養學生管理工作暫行規定」，再進一步規範了委託招生與分配制度的變革。「規定」指出，「省、自治區、直轄市、中央、國務院部門，全民所有制企事業單位委託培養學生，招生時一般不與學生簽訂合同，畢業時，根據學校與委託單位合同規定的人數，參照學生填報的志願由學校按國家計劃內畢業生分配的有關規定向委託單位分配畢業生」。偏遠地區的委託培養，則由考生填寫志願書或訂定合同，畢業後按志願書或合同到委託單位工作。未來，大中專畢業生的分配制度將會繼續改變，學生就業將有較多的主動權。

求學的問題

大陸青年的求學問題，大致有以下幾項：

1. 升學不易。一九八三年全大陸普通初中畢業九百六十餘萬人，可以升入普通高中的只有二百五十九萬人，可以進入中等專業學校的也只有四十七萬人，約有六百五十四萬普通初中畢業生無法繼續進入學校唸書。同樣的，當年全大陸普通高中畢業生二百三十五萬人，可以進入就讀的只有三十九萬餘人，約有一百九十六萬高中畢業生無法升學。連同當年小學畢業無法升入普通初中、農業、職業中學、技工學校的五百六十一萬餘人來看，大陸青年求學的機會的確相當稀少。

2. 經費與師資不足。今年第四期的《未來與發展》刊物中刊登何博傳的文章說，按一九八二年的數字看，大陸人均教育費用只有十一點二元人民幣，還不夠買一張學生書桌用，為世界上十四個人均教育費用不足五美元的地區之一。同時，全部教師中，約有三分之一不甚合格，達三百萬人，由此造成惡性循環，由不合格的教師教出不合格的學生。

不僅如此，已經稀少的教育經費，被擠佔挪用的情況相當嚴重。去年中共審計部門對二十一個省、市、自治區進行教育經費審查，發現教育經費中虛列支出、轉移資金、物資無賬、管理混亂的問題令人咋舌。例如在遼寧省查出教育經費中違紀金額九百五十萬元，被審計的四十六個縣市、教育局，都存在擠佔、挪用教育經費的問題。又如陝西省被查出挪用教育經費五百五十二萬八千元，其中多被教育主管部門挪用蓋房子，買汽車。此外，學校臃腫，非教學人員過多，教育經費效益低落。這種情形都必然影響學校教學質量無法提高。

3. 升學競爭日趨激烈。由於大學院校容量不足，高中畢業生參加統考，錄取率相當的低。相對的，升學競爭也就愈趨激烈。尤其自從胡耀邦在中共「十二大」講話中提出，「使用和提拔幹部必須把學歷、學習成績同工作經歷、工作成績一樣作為重要依據」之後，學歷、文憑主義更助長了升學主義的風氣。今年元月「國家教育委員會」、「國家出版局」和「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聯合發出文件，嚴禁一切出版、非出版單位和個人擅自編寫、出版、銷售學生複習資料，就反映了升學競爭的嚴重。而在統考中，政治審查、保送制度等又為中共特權階級大開方便之門，也人為的造成了不公平的現象。

4. 在中共極權專制的體制之下，教育系統不能免於政治系統的干涉。中共的黨團組織與思想控制，深入校園，相當程度的侵害了學生的自由。各種黨團活動課目如愛國主義教育、形勢政策教育，隨著政治運動的需求，在校園內泛濫，干擾正常的學習。中共的意識形態與學生接觸到體制改革和實際生活之間的矛盾，也使得大陸學生思想波動，困擾他們的學習情緒。

就業的問題

1. 中共大學本科、專科、中專畢業生，以往由計劃分配派遣工作，經常有供需不調的情況。例如一九八一年，大中專畢業生有八十多萬人，而各部門、省、市、自治區的需求則為一百多萬人，呈現供不應求之現象。再從專業看，也不平衡，有的供不應求，有的供過於求。如供不應求差距較大的是政治、財經、工科中的地質、礦業、動力等科目，供過於求的，則主要是一些專業設置過細、學習內容狹窄，或暫時不大需要的專業。由於有供需不調的狀況，因此自然工作分配會發生學非所用的問題。

2. 畢業生工作分配，內地、大中城市和大型廠礦企業需要畢業生較少，邊遠地區、少數民族地區和經濟文化發展較慢地區以及技術力量薄弱的部門，則需要畢業生較多。因此，大中專學生必須面臨至偏遠地區服務的問題，也衍生出大中專畢業生為了到較理想的單位工作而走後門，「找路子，走門子，送條子」，「用人單位越過學校主管分配的部門，直接找畢業生，許以優渥條件拉入」，「搞有償分配」，不投考全國統分統配的重點院校等奇怪現象。甚至許多大中專畢業生不服從分配，而形成問題。

當前經濟管理體制改革，大陸瀰漫「向錢看」的風氣，在畢業生工作分配中，也面臨了畢業生思想變化的情況。今年三月十日「新華社」透露，最近，「中宣部、國家教委、團中央」聯合發出「關於進一步加強高等學校畢業生思想教育工作的通知」，指出一些畢業生受國內外各種思潮的影響，在選擇工作志願時不考慮「事業和國家需要」，過份強調個人志趣；有的追求福利待遇，留戀大城市，不願到艱苦地方去；有的甚至產生待價而沽的想法。因此，「通知」要求做好今年高校畢業生政治思想工作，完成分配工作。此外，去年《中國青年》第九期，刊文分析了當前青年就業取向，發現在青年就業問卷調查中，青年對職業的經濟地位與選擇職業的願望充滿著矛盾。受訪者認為個體戶經濟地位最高，但是選擇職業時却不以之為首，被放在第八位，而評價職業標準時，工資收入卻又高居第二位，顯然，青年就業時，職業的經濟、社會地位，與青年重視經濟因素之間存有矛盾，勢將影響就業時的選擇與就業後的穩定。

大陸青年的就業問題，當然除了上述高校、中專畢業生在工作分配時面臨的問題外，還有上山下鄉、就業無著等問題，尤其龐大的初高中畢業生，無法繼續深造，必須走門路自尋職業，或待業，形成相當巨大的社會壓力。

結語

綜上所述，我們從大陸青年的求學與就業的情況和問題中，可以發現，大陸青年求學之路狹窄，就業前途艱難。展望未來，中共受限於財政的困窘和思想教條的束縛，學校教育不可能迅速擴充，適應青年就業需求。而經濟制度的僵化，改革腳步的遲緩，與政治控制的嚴厲，也使青年就業難以自由化。因此，由求學與就業問題所帶給大陸青年的精神壓力，就將繼續存在，持續的成為青年心緒不穩定的因素之一。這種情況，是否會影響校園乃至社會的安定，確實是相當大的問題。

四、引言報告之三：葉明德先生報告「大陸青年的學潮與示威」

(一)前言：大陸青年學潮的若干特徵

從中共竊據大陸以來，大規模的大陸青年學潮曾經在三個時期出現過；1. 一九五七年「大鳴大放」運動期間；2. 一九六七—六八年，「文化大革命」初期「紅衛兵」騷動階段；3. 一九七八年底—一九七九年初「民主運動」期間。在中共極權統治之下，以上三次學潮大致有以下四項共同特徵；1. 歷次學潮大都係「政治運動」的一環；因此，各次學潮爭論的人事物，學潮意識形態之特徵、學潮活動的範圍與時間，大抵都受到「政治運動」官方意識形態、批判的對象、運動的目標，以及中共黨團運用學生之

策略等之影響；2.學潮表示政治意見的途徑，大致為牆報、壁報、大字報、地下刊物、遊行、上訪（或稱為「取經」）、（下鄉）「點火」、或請願等方法；3.學潮之學生意見，大抵先則下意識地響應中共官方說法，爾後，逐漸思考、領悟與覺醒，最後都對中共之意識形態、制度及施政激烈地抨擊；4.歷次學潮最後都在中共官方意旨轉變後，遭到壓制。

（二）去年大陸學潮的特徵

1.去年，大陸學潮大致集中於兩個時期：二月間，北平及昆明兩地大學生首先騷動，抗議學校設施及學生補助不足，少數學生更開始批評「經濟改革」政策；九月至十二月間，北平、西安、成都及武漢各地大學生相繼批評經濟改革政策，攻擊共黨「不正之風」，並重提改善學校設施之要求。

2.上述兩個階段出現的學潮，大致不是有組織的運動；只是學生們因憤怒與不滿而突然迸發、瞬即行消失的集體騷動。校際之間也少有連繫。

3.中共當局主要係以隔離疏導，及發動「共青團」校園組織功能弭平騷動；並以口頭與大眾媒體警告，嚇阻抗議學生不得輕舉妄動，未採用壓制措施。

去年大陸學潮與以往學潮比較，大抵只有一個相同點：去年大陸學潮中，學生仍多以「大字報」、遊行示威或請願的方法表示政治意見。但是不同的地方有三點：1.去年大陸學潮大致是自動自發的行動，不是響應某種政治運動所引起；是故，去年大陸學潮表現大陸青年個人之心態、想法者多，反映中共官方意旨者少；2.去年大陸學潮大都直截了當批評中共當局之施政與作為，少有人響應中共官方之說法；3.中共當局主要係以疏導方式，驅散學潮，平息學生之不滿，不像以往採用赤裸裸的政治權力壓服學生。

（三）大陸學潮的政治意義

1.大陸大學生最不滿意的是，「經濟改革」所造成的「不正之風」。稍早之前，一項針對平津、瀋陽、大連地區一、七六二名大學生的調查顯示，大多數的學生（四一七名，佔三二·五%）認為，「端正黨風」應是中共「首要的政治任務」；次多的學生（二九四人，佔二〇·三%）則認為，「體制改革」才是主要的政治任務（趙子祥等人著，〈關於大學生的人生觀狀況和特點研究——對十七所大學一七六二名學生的調查報告〉，〈社會科學戰線〉，長春，第一期，一九八四年一月廿五日，一一八—一九頁）。由此可見，大陸學潮對共黨「不正之風」溢於言表，是可以解釋得通的。

2.批評學生待遇未因「經濟改革」而提高才是學潮的重點，「反日」的民族情緒並未持久。去年「九一八」前後，雖有部分大學生有「反日」的抗議行為，但是，去年初的學潮並無「反日」的跡象；而且，十一月底之後，大學生所提出的「反對不正之風、反對賣國求榮、反對自由化」三個口號，主要係針對中共內政措施及官吏作風而來，並不再有「反日」的氣味。由此研判，

在去年大陸學潮之中，大多數大學生係藉口「反日」，以批評中共「經濟改革」的缺失。故指責「經濟改革」之不當，才是大陸學生抗議的重點，而「反日」的民族情緒並不是學潮的最主要原因。

3. 「爭自由」、「爭民主」也不是大陸學潮的重心。在風起雲湧的學潮中，雖有少數學生以「大字報」批評校園「學生組織」無「自主」的功能，但是，類似的意見並不普遍，且不顯著。事實上，前面引用的大學生調查報告中，只有極少數學生（八十九人，佔總數六·二%）主張：「充分發揚民主，健全法制」應是中共第一要緊的政治任務（趙子祥等，前揭文，一一九頁）。

（四）大陸學潮的社會涵義

1. 參加學潮的大學生是大陸較年輕的一代，雖未經歷「文化大革命」，但仍能善用時機，表達不滿的意見及情緒。由此亦可見，新一代大陸青年人對中共目前施政並不滿意，特別是對共產黨貪污枉法的作風痛心疾首。

2. 大陸大學生自視「社會地位」極高。社會其他階層的人亦認為大學生的「社會地位」最高。據《中國青年》所作的一項全大陸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大學生研究生」的「社會地位」在一般人心目中，「居榜首」地位，「個體戶」的社會地位第九，「待業青年」殿後（《中國青年》編輯部，〈透過七萬多份答卷——問卷調查結果分析〉（一），《中國青年》，第九期，一九八五年九月十一日，第七頁）。由此研判，大陸大學生在不久將來，會形成地位甚高的「社會階層」，凌駕其他社會階層，如工人、農民之上。亦因此，在可預見的將來，大陸大學生的思想行為會愈趨獨立，甚至可能進一步對中共的統治權威予以批評。

3. 大陸大學生較注重物質利益。如前所述，大學生的「社會地位」雖居榜首，而且大陸年輕人亦都選擇「大學生研究生」為畢業後第一志願，但是，論到各「職業的經濟地位」時，則以「個體戶」列為第一，「大學生研究生」則跌至倒數第三，僅高於「中、小學教師」及「待業青年」（《中國青年》編輯部，前引書，第八頁）。由此可知，大學生的「社會地位」及「經濟地位」（物質報酬水準），大為懸殊；「經濟地位」跟不上「社會地位」。是故，大學生不滿其「所得」，並在學潮中極力爭取較好的待遇。

（五）結 論

去年，大陸屢仆屢起的學潮，說明了大學生不滿三件事：1. 共黨官員普遍貪污腐化之風；2. 「經濟改革」未能使學生待遇提高；3. 大學設備落後。雖然，有些學生具有「反日」的民族情緒，或要求校園社團組織應有較多的「自主權」；但是，後面這兩點意見，仍屬少數，亦未見持續地反覆表達。

由於大學生的「社會地位」日益被其他社會階層看重，大學生亦自視甚高，所以他們很可能逐漸成為一個獨立性的社會階層，對中共施政予以批評。加上，大學生的「所得」偏低，其「經濟地位」亦普遍被認為屬於較差的社會階層，因此，假如中共不設法改善大學生的待遇及改進大學設備，則大學生的抗議行動還會繼續發生。

其次，去年發生的大陸學潮與示威亦說明了，這一代大學生對政治的態度已逐漸有所改變。上幾代大學生捲入政治運動時，才會被動地瞭解中共一切作為，進而覺悟與批評；這一代大學生雖未碰上「政治運動」時機，仍然找適當的機會，表示不滿的意見，爭取自己的利益。換言之，一九八〇年代以前，前述大陸學潮的一般特徵，係中共統治形式之下的產物，與世界上開發中國家的學生政治稍有不同；但是，去年大陸發生的學潮，漸與一般開發中國家學生運動的性質近似；不僅較具自動自發的性質，及以學生本身利益為目標，而且，大學生此一階層，逐漸與中共當局對立，「異調」增多，這是值得吾人注意的另一現象。

五、引言報告之四：江振昌先生報告「大陸青年的迷惘與覺醒」

我想從社會變遷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目前的中國大陸正面臨一個巨大的社會變遷，不論是在意識形態的轉變、經濟制度的改革、政治體系的更換、工藝技術的改良，乃至社會結構的變動等方面，都顯現出急劇的變化。而這種社會變遷最容易反映在年輕好動的青年身上，特別是經歷過文化大革命和新經濟政策後的大陸青年，更明顯的表現出迷惘和疏離的心態。

中共為培養社會主義新人，特別重視青年的政治教育，著眼於提升愛國心，忠於組織與領導（即毛澤東與中國共產黨），增進對公眾事務的興趣和參與（包括政治課程和羣衆大會）。中共甚至塑造雷鋒、白求恩等典型的共產主義者，作為理想的人格模式。

然而這種政治社會化過程的公民教育，三十多年來在大陸實施的效果並不是很成功，特別是從文化大革命到現在。主要原因是青年在幼年時期所獲得的認知圖案，無法和成長後的社會環境相配合，這種政治社會化的不連續性，使青年產生相信書本、報紙或是相信親眼所見的困惑，這是青年迷惘心態的根源，而文化大革命則是促使社會變遷的重大因素。

文化大革命是一場赤裸裸的權力鬭爭，也是一場激烈的思想鬭爭。當年一些紅衛兵在毛的號令下衝鋒陷陣，「破四舊，立四新」，結果遭到下放農村的噩運，他們在受騙之餘開始醒悟，李一哲、魏京生是代表。另外，在「文革」期間，他們看盡了社會的黑暗面，包括瘋狂煽動下的自相殘殺、人與人關係因告密、提防而極度惡化，以及虛偽盛行、奴性泛濫。更重要的是，在武鬥和下放期間，他們發現那一貫高唱「黨的利益、人民利益高於一切」的所謂優秀共產黨員，原來是一些鑽營的小人和唯利是圖的市儈，有些甚至是罪惡累累、雙手沾滿鮮血的罪犯。如是使得人民羣衆對黨員幹部，並連帶對共產黨的「偉大、光榮、正確」產生懷疑。這是青年對共黨領導的信任危機。

其次，一九七六年毛死後，中共企圖以四個現代化作為取代毛澤東思想的精神支柱。然而十年過去了，負責執行「四化」政策的黨員幹部表現又是如何呢？大陸青年談到「四化」總會說「兩頭熱，中間冷」。中共公人民日報也不諱言地說「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這些廣大黨員幹部在上下交相指責聲中，居然可以我行我素，其奈我何的追求家庭「四化」。如是就產生青年對四化未來的信心危機。

一九七八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鄧小平在大陸推行「對外開放、對內搞活」的新經濟政策。在對內搞活方面，承包責任制的推廣固然鼓舞人們積極工作，城鄉間紛紛出現個體戶、專業戶，甚至萬元戶，生活水平的改善導致生活方式的變遷。但一些中共領導仍在憶苦思甜的說「苦不苦，想想長征二萬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一輩」。青年們開始懷疑艱苦奪鬥、節衣縮食是否為共產主義的最後目標。加以中共對外開放後，西方的政治思潮和社會制度同樣給予大陸青年很大衝擊，一些青年在和資本主義社會比較後，更加深對「社會主義優越性」的懷疑，這是青年對馬列主義的信仰危機。

在三信危機瀰漫下，不少大陸青年感到不安、徬徨。大陸青年迷惘心態最有名的例子是，一九八〇年五月《中國青年》月刊刊載青年女工潘曉的一封信，這篇題為《人生的路呵，怎麼越走越窄》的文章，很快獲得青年的共鳴，短期間內就有四萬多來稿、來信予以同情、支持。其他如一九八二年七月《中國青年報》展開的「人生的支柱是什麼」的討論，一九八三年九月《中國青年》月刊的《當代青年應有怎樣的人生觀》，以及一九八五年八月廣州《羊城晚報》的《向錢看對不對》的討論，都反映出青年對人生意義的迷惘心態。爾後中共雖然開展「五講四美三熱愛」，及「八十年代新雷鋒——張華、張海迪」等宣傳活動，但收效甚微。

基本上，目前大陸上年齡較大的青年迷惘心態表現的要比青少年來的嚴重。而一般青少年在現代潮流的衝擊下，也表現出他們覺醒的一面。我想簡單分作下列三種類型來討論：

(一)講求實惠：大陸這一代青年歷經「文革」的慘痛教訓，很多人因此看破紅塵，只希望往後平安過日子就好。他們的口頭禪是「講現實」，常問的是「有什麼好處」？有興趣的是「物質享受」。由於講究實惠，追尋個人主義，很多人喪心信奉「主觀為自我、客觀為他人」。目前大陸上流行的一句順口溜是：「五十年代人幫人、六十年代人鬥人、七十年代人怕人、八十年代則是各人顧各人」。由於「各人顧各人」的結果，使「全民皆兵」的「社會主義祖國」變成了「全民皆商」的現實主義。中共領導大叫「向前看」，人民一齊「向錢看」。不少青年都把「為個人的名利奮鬥」作為人生的支柱。

(二)排斥政治：過去，許多人熱衷地追求入黨、當兵，認為作政治幹部是一種光榮的職業。如今，政治價值在人們心中已降為零，人們普遍對入黨失去興趣，政治幹部紛紛改行。毛澤東時代，人們對政府威信、集體權威的服從，已不復存在當今中共統治下的社會。而今天大陸青年對政治的極度冷漠和厭倦，使他們相信「談政治不是愚蠢就是神經病」。這種排斥政治的心理也表現在如下三方面：1. 政治課程沒人愛上，2. 政治運動紛紛走避，3. 入黨入團意願低落。據《人民日報》統計，五〇年代青年黨員佔全部黨員的二六·六%，而一九八三年底竟下降到三·三四%。另大陸上目前一百二十萬大學生中，大學本科生入黨人數才一萬多人。這些都顯示青年「不問政治」的傾向。

(三)觀念新穎：大陸青年開始提出「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口號，這與以往「吃大鍋飯、拿鐵飯碗，不做一個樣

「的工作態度大不相同。其次，青年們認同「強烈競爭」，認為集體主義或平均主義不合時代潮流。另外，他們也講求「充實知識技能」，社會上自學成才的青年越來越多。再者，他們要求生活多樣化，他們的生活觀是「既會創造，又會享受」。他們希望「吃講營養，住講寬敞，穿講漂亮，用講高檔。」換言之，就是要「拼命的幹，痛快的玩。」

最後，我想作個簡單的結論：

(一)經過文化大革命的一年輕一代，恰如中共所說：「十年的政治大動亂，鍛鍊了青年的政治素養，許多青年都喜歡從政治上觀察和解決問題，喜歡思考問題，但由此而產生的懷疑和看透也表現的普遍突出。」

(二)大陸青年勇於探索自我價值。「主觀為自我、客觀為別人」及「既要奉獻，也要索取」，已成為大多數青年的人生觀。正如《中國青年》月刊所說，「現在，八十年代青年鮮明地提出自我價值問題」。我們從近年來大陸上一些文藝作品，如白樺的《苦戀》，戴厚英的《人啊！人》，劉賓雁的《人妖之間》及話劇劇本《我們》等，基本上都可看出他們多在探討人性和人的價值。

(三)一九八二年秋中共召開「十二大」期間，《人民日報》刊載一段頗值玩味的順口溜，說某地青年「提共產主義就冷笑，提馬列主義就譏笑，提社會主義就失笑，提為共產主義奮鬥就哈哈大笑。」我想以這個順口溜作為「大陸青年的迷惘與覺醒」引言報告的結束語。

六、自由討論

王章陵先生：當前大陸青年心理與行為動向的觀察

剛纔聽到引言人的報告，可以知道，當前大陸青年心理與行為，與「文革」前比較，確有顯著的變化。我們再舉幾件小的事情來說：

中共高級官員子女，「文革」以前，都以當兵為自己選擇的出路，因為當兵有最好的待遇與最高的榮譽；可是，現在却不願當兵了，現在都喜歡做生意，喜歡做經理，做董事長。

又如：「文革」以前，一般青年都希望爭取入團入黨，因為入了黨團，就有了好的前途；而現在，却喜歡搞一張文憑，喜歡擠入「臭老九」的行列。

「文革」時期，有一位外國記者訪問女紅衛兵，問她有男朋友嗎？她說，我忙得很，讀《毛語錄》都沒有時間，那有閒情逸致搞那「資產階級」的玩意兒。現在大陸年輕人却喜歡跳舞、喜歡穿西裝、女孩子喜歡燙髮、結婚喜歡擺排場。還有，就是色情、兇殺的小報小說，受到廣大青年的喜愛，而且，犯罪事件層出不窮。

這些變化，說明大陸青年的心理與行為都在變。但是，是否只是青年變？又不是。我們看中共歷次黨政大會發表的照片，過

去一律穿列寧裝，而去年九月的黨代表大會，却有兩個人穿西裝；像中共的高級官員周而復，在大陸學術政治地位都很高，年齡也已一大把，而他到日本，却到妓女戶去享受風花雪月的樂趣。由此可知，這種變，不只在青年階層，而是在大陸各階層。

今天大陸社會出現這樣的巨變，它說明兩點意義：

第一、是反映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價值體系與權威的破產；

第二、是向個人主義、資本主義認同。

其實，這種現象，中共當局早已覺察到，依照他們的說法，這種現象，就是「精神污染」，就是「資產階級自由化」。但是問題發生了，究竟怎樣解決？中共曾想搞一個「清除污染」的政治運動，但並不十分徹底。近年來，只是採取一些治標的辦法：

在積極方面，是加強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在各級學校設置思想品德課，教導青年重新認識「共產主義美好理想」；在消極方面，就是嚴刑峻法，打擊「不正之風」及「經濟犯罪」。據一九八五年四月十六日《陝西日報》透露，六名男女青年因在西安舉辦狂歡舞會，而被判處死刑。這恐怕是世界上最為嚴苛的法律。

事實說明：鄧小平治標的辦法，並不能根本解決問題，而且更使問題複雜化，進一步發展，就是由文化衝突上升而為政治衝突。它的具體表現，就是去年八、九月大陸學潮的爆發。

去年大陸的學潮，已經引起國際社會及臺灣研究中共問題專家的注意。關於學潮產生的原因，現在有三種不同的說法：一說是自發的；一說是中共發動的；一說是反鄧派發動的，陳雲就是一個幕後支持的力量。關於它的本質，也有兩種說法：一說認為它是爭民主、爭自由的反共運動；一說認為它只是反鄧，並不是反共。

站在了解敵情的需要方面說，我們對這些問題的深入研究，是很必要的。

我個人認為，學潮是一種羣衆行為的產物，所以出現學潮，必然有它複雜的多方面的因素。不過，儘管學潮形成的因素很多，而當學潮能由一個學校的範圍發展到很多學校，甚至形成全面性的運動，那末，這個運動，就絕對不是自發的，而是有一個政治集團在幕後推動。像一九七六年的「天安門事件」，當時也有人認為是自發的，可是，事後才知道，它的幕後有一個「改革派」政治集團在支持，後來鄧小平等所以為「天安門事件」平反，原因即在乎此。因此，我認為對去年學潮真相的了解，是很重要的。因為它不只是一個青年思想問題，而是一個觀察今後大陸變局發展訊息的、最為重要的政治問題。

楊逢泰先生：八十年代是中國大陸文化的分水嶺

知識青年的思想與行為反映現實社會和時代的思潮。在西方，拿破崙戰爭後民族主義和自由主義是一對學生的運動，其力量主要是來自奧地利帝國和鄂托曼帝國統治下的青年，他們反對復辟王朝的正統主義，而要求民族獨立和自由主義的憲法。

在中國現代史中，青年也扮演了推動歷史巨輪的角色，西方學者認為西方社會的四個粒子是：大學、軍隊、政府和教會，因此企圖破壞社會秩序，必須搖撼和腐蝕這四根社會的支柱。根據個人研究和體認，青年的學潮和示威至少可分為兩種，第一種是自動自發的青年運動，如西方的青年運動，第二種是蓄意滲透和製造的運動，如大陸淪陷前的學潮。

文化是人類行為中學習的部分。今天中國大陸青年對共產主義希望幻滅以後所表現的追求民主和自由的願望，無論是自動自發的青年運動，或者是反鄧份子所製造，都是中共一個世代極權統治的結果。在中共實行開放政策以後大陸青年放棄了西方文化中的垃圾——馬克思主義，而接受了西方文化中民主和自由的觀念，個人的觀察是，八十年代將是中國大陸文化的分水嶺，他們將在修正主義、資本主義和三民主義三者中作睿智的選擇。

馬起華先生：

(一) 抗戰勝利後，中共搞青年運動（反內戰、反迫害、反饑餓）搞垮了國民政府，現在它面臨青年運動，自有一套對付的辦法，這是值得注意的。

(二) 由於大陸青年反對四個堅持，因而三信危機仍然存在，並未解除。

(三) 大陸青年和臺灣青年均傾向於注重現實，但二者原因不同，其表現亦不同。前者由於共產主義之渺茫，故注重眼前的物質，特別是向錢看；臺灣青年注重現實，原因甚多，而傾向於功利主義。對於功利主義，應該導正，以免偏差。

(四) 大陸青年厭惡共產主義，嚮往三民主義，而臺灣青年並未厭惡三民主義，也未嚮往共產主義，其原因不是因為臺灣對青年的三民主義教育超過中共的共產主義教育（事實上正相反），而是因為三民主義優於共產主義，三民主義成功，共產主義失敗。

(五) 復興基地實行三民主義，應超過共產主義，拉大二者的差距，不是縮小二者的差距。

段家鋒先生：

(一) 大陸青年的一般心態有：

1. 不再信任政策、口號、目標等等高調，不聽、不唸、不談。

2. 沒有人生奮鬥問題，他最大痛苦是兒女不求上進，能混到個工人位置，已很滿足——因為他住在城市。

3. 農村的包產到戶、個體戶、專業戶等政策，對農民有點刺激，但青年一般都怕苦，很少要去當農民。

(二) 他們倒希望做到：

1. 走關係出國，等而下之找任何關係能和外國攀個親戚關係，能通封信，就是最大光榮，生活在幻想裏。

2. 美國、日本、歐洲一切都是好的，衣服上一定要帶著牌子、墨鏡、牛仔褲。崇拜美國人，已經到發狂程度。

3. 設法跑單幫、賺錢、騙錢。

4. 絕對沒有在美國看到那種發憤讀書，拼命工作的現象，吃點好的，穿講究點，沒有真話，絕對自私自利。

5. 社會主義云云，是完全沒有人信了，絕對性的破產。

芮和燕先生：從青年人的特質去探討問題

青年人有其特質，今日大陸青年當亦不例外，可能在某一特質方面，更會強烈的顯示出來。今日大陸青年給予人的形象，歸納言之有三：

其一、理想性：所謂「理想性」，就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人之可貴就是要有理想。但如成為一個純理想主義者，那就會和他所處的實際接觸面發生對立。今日大陸大學院校青年，就是有他的理想主義，當然會和中共的意識形態以及它的所作所為，發生嚴重的矛盾與對立。

其二、叛逆性：此所謂「叛逆性」，就是青年的身心，在成長過程中，會反傳統、反權威、反教條化的意識形態，好像是一團熊熊烈火，這也是青年的天真和可貴處。但是如果缺乏愛心與溫情的輔導，那這批身心尚未成熟的青年人橫衝直撞，社會也就會受到搖撼了。今日大陸青年，一般而言，「叛逆性」非常顯著，因為他們看透了中共的謊言與暴行，當然他們會更熱烈豎起反權威、反教條的大纛了。

其三、現實性：在功利主義的刺激下，青年人也就會染上了「現實性」。尤其在中共多年的壓制與封閉下，現在引進了「資本主義」的技術與產品，當然也會使青年人知道「現實」是怎麼一回事，因也就不擇手段，去把握現實了。中共頭頭們愈喊叫「精神污染」，也就顯示社會大眾行為愈趨於「現實性」，這真是莫己能禦，而青年人在耳濡目染下，當然也就不例外了。

所以從上面三點看來，今日大陸上的青年人，確使中共頭痛，也是中共偽政權的最大危機。然而我們要注意一點，他們反對中共的意識型態以及它的所作所為，和認同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中間還有一段距離，這種有利的客觀態勢，還要看我們如何去主觀的努力了。切不可一味的以主觀認定，而不去分析客觀事實，那就令人非常遺憾。如何從敵人內部鼓動風潮，造成時勢，這是我們當前應該從各方面去達成，全力以赴的。

玄默先生：

關於大陸青年的心態和動向，我想指出下面幾點事實和情況：

(一) 王炳章在美國出版的《中國之春》雜誌，經常發表由大陸青年供給的中共內部文件和內幕消息，證明大陸社會以知識青年為主導的反對共產極權和爭取自由民主的活動不但存在，且在秘密發展。

(二) 老一輩理論家如王若水之流，提出「社會主義異化論」，有「異化」即可「復歸」，目的在於為中共辯解，向人民說教。

青年一代的理論工作者就不是這樣，他們評價馬克思主義，提出學術自由，要求保障學派，主張思想觀點多樣化。這一切，都有可能使馬克思主義從神聖教條還原為一家之言。

(三) 青年文藝工作者不屈服於中共的政治干預和壓力，干犯中共禁慾主義的清規戒律的作品和體現西方現代文藝思潮的創作和理論，不斷出現，明白顯示了毛澤東文藝路線的沒落。

(四) 去年自九月至年底許多城市發生學潮和工潮，對中共幹部貪污腐化、無恥無能，中共對其違法亂紀官僚以黨紀政紀代替「國法」、軍律的作風，表示強烈的不滿。大學生為組織全面性紀念「一二·九」運動五十週年，以表達反中共專政意志的秘密串連活動雖被中共所壓制而平息，仍然證明了知識青年為中共最大的隱憂。

(五) 傳統文化的恢復整理、研究和重新肯定，西方學術和思潮的不斷傳播，都有助於大陸青年突破馬列毛教條的束縛，使他們逐漸了解中國的出路不在馬列毛教條之內，而在馬列毛教條之外。這種認識上的「解蔽」，現在已經不是希望而是開始出現的事實了。

(六) 由上面這幾點，我認為大陸青年反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反對中共專政和社會主義制度，是不可改變、不可阻遏的心態和動向。他們對鄧小平派的改革，不但支持，而且但願走得更快更遠；因為改革的持續和擴大，終將造成一個知識分子的取代老粗幹部的環境，完全符合他們的利益。在這裏還可以看到大陸青年和中共之間的利害衝突。加上升大學、出國留學、就業，以及所謂「太子黨」接班等問題的幹部子弟特權，更使矛盾加深而難以調和。

李正中先生：當前大陸青年的心理與動向

(一) 當前大陸社會的情境

1. 人類心理與行為是現實社會對個人刺激與反射各種因素組合衝擊而成，它有低級的反射行為、次級的習慣行為、高級的理智與聯想行為；社會心理學家湯麥士 (Thomas) 說：「人類的社會慾望有四：(1) 安全慾；(2) 新知慾；(3) 感應慾；(4) 權勢慾。」青年在生理上雖發育完成，但觀念意識尚未定型，受社會上的直接刺激反應最快，而固有的社會習慣，尚未能予以制約，因而其理智與聯想亦愈大，其新知慾、感應慾特別強烈。

2. 當前大陸青年是從文化大革命社會背景中長成，一面那時的革命小將，一變而被下放農村或成為勞改犯；另一面當時的牛鬼蛇神却成為現在的時代的英雄，這些現實的刺激，却給青年人在心理上以莫大的影響。

當前大陸社會有三個層次的轉變與交錯：(1) 一般農業社會轉向工業社會之轉變；(2) 由毛式封鎖型的共產體制轉向半開放型的共產體制；(3) 西方自由民主潮流的衝擊而引起的意識形態、生活方式的變化與激盪。固有社會結構解紐，共黨「革命人格」的分解，價值標準的變化，觀念意識的混淆，將當前大陸變為一個錯綜複雜離史無前例的社會形態！

(一)當前大陸青年心理與動向

1. 迷惘與失落感：十九世紀初期資本主義所造成的貧富不均，使人類社會發生許多悲慘現象，因而社會主義興起，特別馬列主義的信徒更以科學社會主義者的姿態，為建立「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社會而奮鬥，從俄共到中共的黨徒都是以「革命家」「前進份子」自詡，不可一世的沉醉於象牙之塔裏；現在一代英雄的林四份子變為歷史的罪人或階下囚；社會的貧窮落後，青年求學、就業、婚姻等等的艱難，「理想國」更不知在遙遠的何方；「改革」引起問題重重，亦未帶來新的希望，理想主義的幻滅，青年人心靈空虛，而感到迷惘、徬徨，成為失落的一代。一九八〇年五月中共共青團刊物《中國青年》所刊青年女工潘曉的投書「人生的路啊，怎麼越走越窄」，就是一例！這些青年他們苦悶、吶喊、摸索、掙扎正在找尋生活的與精神的出路！

2. 追求現實享受，為生活而生活：人類當陷於極痛苦的深淵時，遂變為一個單純的動物，祇希求維持生命的延續，而放棄一切希望與理想。中共自一九七九年起實行對外開放，對內經濟體制改革，開設經濟特區，一時風起雲湧，自由世界的生活方式衝進大陸，一般人的物質慾望上昇，奔走鑽營，均欲獲得現代化的生活享受；青年人在這種花花世界裏，眼花撩亂，為適應生存，不得不隨波逐流，謀求現實生活問題的解決。被下放的青年倒流城市，請願示威，或打、砸、搶；已有工作者則希圖獲得較好位置，走後門，說人情；或患「磨病」，無志氣無理想「怠工」「擱窩」，整天渾渾噩噩，考慮個人利益過多，不顧整體利益，這是由迷失的一代轉為墮落的一代！

3. 對社會不滿與憤激，而行為變態：當前大陸社會正值劇烈的變遷中，農村人口向城市集中，城市工業尚未發達足以容納這些過剩人口，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因財力不足均無法配合發展，於是青年精神苦悶，走投無路，一有機會即以反社會行為的方法，以資突破謀求個人的出路；在中共官僚權力體系內的子弟，即利用特權投機倒把，獲得暴利，揮霍無度；一般社會青年有些則用各種非法手段如走私、販毒、搶劫、詐騙、黑市買賣、並從事經濟犯罪，以資反抗；這是在轉型期惡劣的政治環境中所產生的變態的年輕一代！

4. 對共產主義失望尋求新理想與新希望：自五四運動至現在，中國青年雖有時在大時代中迷失方向，但由於因歷史的理旋與時代的轉變，客觀事實的印證，而青年人有天真之氣與正義感，終能理性復甦，對現實事物作客觀的評價與鑑定，現在整個世界保守主義興起，「私有化」運動（privatization）在各國推進，大陸共產主義破產，復興基地臺灣三民主義建設成功，這些浪潮反映在大陸已使大多數青年從夢中驚醒，追求於理想與新希望，最近大陸各大學的學潮，就是被壓抑諸衝突的解放，藉反日而高喊反帝國、反官僚、反特權、反物價上漲、要生活、要吃飯，就是大陸青年覺醒的一代！

(三)我們的對策

1. 以上所分析的當前大陸青年的心理與動向，歸納起來有一個共同點，即對共產主義的失望與不滿，正在徬徨迷惘以各種方

式尋出路！

2. 共產主義生於歷史的發展與時代潮流之中；我們應從歷史的現實與遠景，特別對中國前途的公開的認識與辨別，以建立共識，以挽救中國，進而扭轉人類的命運！

唐 勃先生：中國大陸學潮與青年願望

中共在大陸上誘騙青年、組織青年、利用青年、驅役青年為維護它的既得利益、鞏固它的暴政集團而獻心獻力，所用的手段和方法，確實可以說是惡毒、卑劣，無所不用其極。但今天，種種事實與跡象，中共正面臨來自千千萬萬大陸青年要求民主自由的挑戰，這個靠誘騙青年起家的紅色政權，不久的將來，終將在青年的覺醒中崩潰覆亡。

大家都知道，鄧小平再度掌權以後，對外刻意製造所謂「外順」的假象，對內則推行一系列的調整與改革，實行對外開放，藉以掙扎求變、救亡圖存，解決其「內逆」的危機。而這種假借「外順」的假象，來解決「內逆」的危機的兩手策略，令大陸青年難以瞭解，更難以接受的。

大陸上的青年，尤其知識青年，本來是支持鄧小平的改革和開放政策的。可是一九八五年以來，中共對物價和工資的改革，導致物價劇烈上漲，長期高居不下，不但沒有像中共宣傳的能改善人民的生活，反而是大大降低了他們的生活水平，這已經令大陸青年又一次的感到失望和不满。

更糟的是，他們發現：物價猛升、通貨膨脹、市場投機，都是出自中共幹部的自私與無知。中共黨政軍機關和領導官僚，利用各種特權，明目張膽地走私販私、買空賣空、貪污受賄、投機詐騙、徇私舞弊，無所不為、無惡不作。大陸青年看在眼里、積在心裏，當然從失望不滿，進而絕望、憤恨。

最近發生在北平地區的「九一八」學潮和發生在西安地區的「十一」學潮，表面上打的是「反日」的旗號，骨子裏是發洩對中共政策強烈的不滿，也就是大陸青年與中共在思想上與行動上的尖銳對立。

這次北平及西安地區的學潮，是大陸上近年來繼「四五天安門事件」及「北京之春」之後，最具規模的學生反共示威運動。此次學潮不僅是自發性的，而且是經過精心策劃與週密安排。單就發生的時間來看，前者「九一八」學潮，選擇了中共「全國代表大會」開幕之日；後者「十一」學潮，則是中共偽政權誕生之日。這顯然是要給中共「臉上抹黑」，決不是巧合。而尤其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這個在校園裏掀起的風潮，事實上是一場反帝反共鬭爭，所追求的是當年魏京生所倡議的「第五個現代化」，也就是政治民主化。

中共深怕這種風潮一旦爆發，極易釀成政治風暴。在震驚之餘，急忙派出大批警察，封鎖有關學校，先控制局勢，再以分化、勸告、鎮壓兼施的手段，抑制這個反改革遊行示威的「學潮」。同時，為了解決長期以來大陸青年思想行動的種種矛盾與問題

，臨時性地提前召開共青團的「全代會」和「十一屆四中全會」，想加強對大陸青年的壓制工作，企圖繼續掌握青年、利用青年。

事實上，「文革」的動亂，留給大陸青年的苦痛和創傷，並沒有因時間的過去而流逝。加上中共「四化、統一、反霸」的路線方針，存在了太多的矛盾、衝突和困難，儘管中共費盡心機加強對大陸青年的思想政治教育，也無法阻止他們「由盲信而懷疑，由懷疑而覺醒」。學潮中出現的要求自由民主的大字報、批評中共施政的演說，在中共哄騙、安撫、疏導、壓制下，表面上是過去了。其實中共心裏非常明白，這股餘火未熄的野火，隨時可以復燃，隨時可能爆發。

關於大陸青年的願望方面，中共「共青團」機關雜誌《中國青年》月刊一九八五年第十二期，曾經刊出一篇廣西通訊員陳維邦的調查報告《農村青年的六個渴望》，提出了大陸農村青年渴望解決的六個問題：1. 渴望求學。2. 渴望結婚不送彩禮、不辦筵席。3. 渴望掌握致富技術、找到致富門路。4. 渴望文化娛樂。5. 渴望改變消費結構。6. 渴望旅遊。

這份報告正是「一葉落而知秋」的真實寫照，值得關心大陸青年工作、學習、生活的人密切注意。

徐炳德先生：

(一) 大陸青年的思想與言行情況

去（七四）年二月上旬，「廣西大學」學生不滿該校管理不民主，教學、經濟皆不合理，因而在校園內張貼大字報以示抗議。其主要內容為：

1. 管理不民主：黨、政分離流於形式，仍然是黨委治校，校長、系主任有職無權，所謂「民主治校」只是空話。
2. 教學不合理：教師中派系林立，授課時數多少完全由各派系決定，而不考慮教師素質；學生普遍排斥低素質教師，以罷課表示不滿。

3. 經濟不合理：學校伙食差、費用高，學生負擔不起，獎學金制度變化不定，不符合學生所需；另對教育投資偏低，與其高唱培養人才政策相互矛盾。

(二) 大陸青年的求學與就業狀況

去（七四）年九月廿一日中共《中國青年報》刊載中共冶金部、農牧漁業部、文化部、中國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等十一個「國家機關」之問卷調查報告，指出該等單位所屬一千一百餘名大學畢業生和研究生之青年知識幹部，一般具有下述三項強烈反應：

1. 要求充分發揮所學，以施展抱負。在問卷中填「希望發揮作用，快出成果，早成人才」的佔三分之一，認為自己目前「不能充分發揮作用」或「完全不能發揮作用」者佔三分之二。形成該問題的原因有三：（1）職務動輒「論資」調派，（2）智力浪

費現象嚴重，(3)人才學非所用。

2. 渴望獲得再學習的渠道及更新的知識。對問卷「你對後勤工作有何意見」，絕大多數要求加快圖書館和資料室建設。許多部門領導對青年繼續求學問題，缺乏規劃，措施不力，甚至認為知識青年已經文憑在手，不用再學習了，有進修機會時却安排「兩手空空」的人去撈文憑。

3. 爭取政治地位的提昇。在被調查的對象中，有百分之四十強的人具有加入共黨的念頭，雖然積極參與「黨章學習」等活動，惟一直未被單位重視。致在「國家機關」系統中二十五歲以下黨員數量只佔全體黨員的百分之三點四，此與「國家機關」的性質、地位及青年學歷較高的特點，極不相稱。

(三)大陸青年的學潮與示威情況

去(七四)年九、十月間，北平地區各大學校園相繼出現攻擊中共政權之大字報，例如九月間「北京工業大學」校園張貼「反對當權者欺壓人民崇洋媚外的行徑」大字報，要求人民爭取民主、自由，由自己決定未來政策及命運，數日後「北大」校園亦刊出類似大字報，提出「社會主義的民主實際上是少數統治者的專利，我們要的是全面的民主；我們要學習的是西方的民主精神，不是去像乞丐似的乞討施捨」，其後北平地區各大專院校並利用「九一八」遊行機會，大肆抨擊中共當局「賣國求援」。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胡啓立為恐事態擴大，演變成再一次「天安門事件」，已下達指示「徹查幕後主使，不要輕易抓人」，以免刺激學生成為新的導火線。

十二月十二日夜晚，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學生在該校校園秘密張貼題為「浦江兩岸為何如此平靜」之大字報，暗示北平各大學學生正掀起學運風潮，而上海地區學生却毫無反應。翌日晨，並有激進學生在大字報旁，另行張貼「浦江兩岸並不平靜」大字報以為呼應，復有大批學生趨前聚合討論，計劃發起上海地區學潮運動。後為上海公安部門派遣「武警」所嚇阻。

(四)大陸青年的迷惘與覺醒情況

去(七四)年三月間，「福州大學」學生間廣泛討論著一個問題：「究竟目前的開放政策係源自三民主義還是馬列主義」？有的大學生在《孫中山選集》上找到幾點論證：「歡迎外資、歡迎外才，以發展我生產事業」，「惟發展主權，操之在我則存，操之在人則亡」。國父在闡述利用外資定下四項原則：「(1)必選最有利之途，以吸外資；(2)必應國民之所最需要；(3)必期抵抗之至少；(4)必擇地位之適宜」。且不少大學生認為，搞經濟特區與進一步開放十四個沿海城市，與國父之四個原則甚為吻合。目前之政策實際是根據三民主義而來的，有的中共黨員聽到如此論調，也感到十分困擾，亦頗有同感，因為在馬列主義理論中，

註① 「惟發展主權，操之在我則存，操之在人則亡」。出自「實業計劃自序」《總理全書》之三第二頁。

註② 國父闡述利用外資四原則，見「實業計劃第一計劃」《總理全書》之三第一二頁。

實在找不出相近之根據和支持，去搞對外開放。

陳定中先生：大陸青年由覺醒而反共

中共抄襲自蘇俄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經過三十多年來的實踐，越走越窮，最後到了絕路的盡頭，迫使鄧派不得不尋求「改革」突破。但近七年來中共在經濟方面的掙扎求變，仍然弊多利少，越變越亂。這中間大陸青年身歷其境，都有切膚之痛，加上中共對外開放之後，外來思想觀念對大陸青年的刺激，因而表現出各式各樣的複雜心態。從總方面看，三十多年來大陸青年的心路歷程，是由理想幻滅到迷惘，由迷惘到覺醒，由覺醒到對中共的疏離與對抗，進而走上反共的道路。最近有兩件事可作具體說明。其一是蕭天潤、陳寶忠義士的駕機投奔自由；其二是江西省橫峯縣青年彭少勇，設計奪得中共兩挺機槍、兩支衝鋒槍、一支自動步槍和一支手槍，於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廈門準備渡海投奔自由時，不幸被中共截獲。他們這三個人都是所謂「吃共產黨奶水長大的」，長期受到社會主義教育的灌輸，但最後仍然是走上反共的道路。這說明中共對大陸青年施行欺騙的伎倆已經喪失作用了。

近年來大陸由「三信危機」所衍生的三論危機，即「共產主義渺茫論」、「社會主義異化論」、「馬列主義過時論」，同樣也反映出大陸青年對馬列邪說的唾棄。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十一日中共《人民日報》發表題為〈信仰危機說明什麼？〉的文章，指出大陸青年在一張調查表上詢問「你相信馬克思主義嗎？」回答是：「不，我不相信」。中共承認，這就是「令人吃驚」的「信仰危機」。

一九八一年二月二十四日，中共《人民日報》發表一篇調查資料，其中作者在福建、安徽兩省分別對九百八十七名青年進行調查。調查結果，認為「社會主義制度沒有優越性的」，佔了百分之三十五點四。認為在本世紀末實現四個現代化沒有信心的，佔了百分之五十六點六。

一九八二年八月十日至九月十五日，中共《半月談》雜誌一連三期發表三篇〈破除共產主義渺茫論〉的評論員文章，承認有人公開提出「共產主義渺茫，像天上的月亮那樣可望而不可即」，「共產主義沒有經過實踐檢驗」，「現在談共產主義不現實」。同年九月一日胡耀邦在中共「十二大」的報告也承認：大陸青年認為「共產主義沒有經過實踐檢驗」，「共產主義是渺茫的幻想」。

中共還承認「有些大學上政治課學生就走了，講毛澤東思想下面就笑開了」。承認大陸青年「提共產主義就冷笑，提馬列主義就譏笑，提社會主義就失笑，提為共產主義奮鬥就哈哈大笑」。

此外，中共報刊所發表的一些問卷調查資料，雖然是經過篩選才公開發表，但相當部份仍然反映出大陸青年否定中共政權的心態。例如一九八四年一月刊於吉林大學《社會科學戰線》月刊的調查資料，就有百分之四十的大學生，認為共產主義與人的本

性矛盾，行不通，缺乏實證。一九八五年一月刊於上海《社會》雙月刊的資料也指出，青年們認為共產主義理想是未來的未來，遙不可及。

反映問題比較多的是一九八五年上半年中共「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曾對城市經濟改革作過問卷調查，刊載於《經濟研究》月刊一九八五年第十一期，題目為《改革：我們面臨的挑戰與選擇》。

該項調查係以青年為主要對象，包含二十七個城市的四百二十九個企業。其中：

對價格改革心理反應調查，共有四千四百之六十六份問卷。

對青年擇業傾向和經濟生活基本態度調查，共有七萬六千份問卷。

對社會保障制度調查，共有一千三百四十一份問卷。

調查的結果是：

(一)關於對改革的態度

1. 願意承擔改革風險者佔百分之七十八點三，不願意改革者佔百分之二十一點七。

2. 認為改革雖造成混亂但比吃大鍋飯好一點的佔百分之七十七點八，不贊成改革的佔百分之二十二點二。

(二)關於對物價管制的態度

1. 贊成價格部分開放、部分管制的佔百分之五十八點二。

2. 贊成物價全部加以管制者佔百分之三十四點七。

(三)關於青年選擇就業的態度

1. 不滿目前就業制度者佔百分之六十以上。

2. 甘冒風險希望自由就業者佔百分之六十一。

3. 希望能改變職業者佔百分之四十八點二。

4. 希望能調換工作環境者佔百分之五十點二。

(四)關於職業的選擇

1. 百分之六十二點二的青年表示，只要工作體面，收入多少沒關係。

2. 百分之八十五點五的青年表示，只要工作合乎個人興趣就可以。

七、主席結論：

聽了諸位學者專家高見之後，我想表示一些個人的看法：今天我們跟中共對立的情勢有好有壞，從壞的方面來看，中共所控

制的人口，面積比我們要大得多，中共已進入國際社會，有國際勢力的支持；但若從好的方面來看，仍有很多機會可加利用。一九七二年尼克森去大陸訪問，對我們外交處境固然有不利影響，但尼周上海公報却促使大陸對外開放。可以這樣說，大陸開放的幅度愈大，則對大陸的影響力亦相對的愈大。例如「香港問題」就是一個很好的機會，中共若不與香港統一，則香港完全和大陸隔離，其影響力就幾乎微不足道，但一旦中共談統一，談「一國兩制」，則大陸其他各地就會自然的反省，為什麼可以允許香港實行資本主義制度，而我們內地省份就不允許？今天的中共在我看來實在是「一國四制」——鄉村、城市、經濟特區及香港和澳門一共有四種不同的制度在運作，其混亂和矛盾自非中共行政體制可以解決的。

今天大陸海外留學生乃是我們最佳的運用對象。回想滿清政府因變法失敗，大量派遣留學生出國學習，僅一九〇六年就有一萬三千多留日學生；其中更分成保皇派和革命派；雙方爭執不休，最後以革命派得勢。今日，中共有三萬多留學生在海外，每年尚有數千名考察人員在海外學習，這些都是我們工作的對象。雖然有些海外中共留學生認為臺灣力量不足，如果我們善加利用現有報紙、雜誌以及在海外各地舉辦中國未來前途之研討會，我想中共的模式在會中一定遭受批評；而新加坡模式、香港模式、臺灣模式必受肯定。另外，新加坡僅是一個城邦國家，其模式不易效法。而香港模式是殖民主義模式，亦難為中國所採行；唯有臺灣模式是中國人行之有效的模式。北美「唐人街」模式之吸引力更是微不足道。若我們能鼓動風潮、創造時勢，則必有可為。

去年從香港回返大陸訪問的華人，有四千萬人次之多，這一巨大人潮，對中共所造成影響，必可逐漸促使大陸內部轉變。今天大陸青年因受中共三十多年的統治之影響，特別是「文革」之影響，志氣都很小，以「向錢看」為潮流。若我們能鼓勵他們恢宏志氣；為中國的未來多思考，大陸就會有很大的變化。

今天這個學術座談會開得很有意義，希望我們在各自崗位上繼續努力。